

孙中山与香山买办

胡 波

[摘要] 本文全面论述了孙中山与香山买办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香山买办在商场和官场上如鱼得水的经历激发了孙中山的人生梦想，影响了孙中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加速了孙中山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

[关键词] 孙中山 郑观应 香山买办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7)05-0105-06

孙中山与香山买办之间有何直接或间接联系，学术界似乎关注不够，目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是孙中山与郑观应的交往和相互影响^①，但他们并不是着眼于郑观应的买办身份和买办经历，而是从思想文化上来加以讨论的。其实，孙中山与香山买办的交往在其思想形成和革命活动早期的作用和影响不应忽视。

—

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负山濒海，地多砂碛，土质饶劣，不宜于耕”^②。因此有不少人出洋谋生或到外商洋行任买办，杨礼丰、陆厚车、陆仁车和陆皓东的父亲陆廷光等就是洋行的买办^③。翠亨村与郑观应、唐廷枢、莫仕扬的家乡相距不到10公里，与徐润的家乡相距也不超过20公里。1866年孙中山诞生时，正是以徐润、唐廷枢、莫仕扬和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中外商贸活动中大显身手的时候。这个时期，香山买办除了任职洋行买办外，在个人投资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如在宝顺洋行任职的徐润，除了自办宝源祥荣棧外，还投资于房地产和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而唐廷枢在担任上海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同时，还大量附股于西方人的轮船航运业，并投资钱庄、典当、贩盐等中国传统的商业领域。郑观应此时虽在经济实力方面难以与徐润、唐廷枢、莫仕扬相比，他个人的独立投资和经营活动尚属起步阶段，但也在茶业、轮船业、贩盐业等领域有一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④。

孙中山入学启蒙的时候，正是香山买办从洋行买办向近代企业家蜕变的时期。以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为标志，清政府提倡的洋务运动开始由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转变，香山买办不但成

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且在其中还取得了重要地位，成为洋务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孙中山在夏威夷、广州和香港求学的阶段，香山买办在近代工商业中的地位和影响虽然有所动摇，但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和政治主张随着他的《易言》和《盛世危言》的出版却广为传播，成为19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强有力的声音^⑤。

二

孙中山在青少年时期虽然与以徐润、唐廷枢、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没有直接的交往，但他们在洋行当买办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事迹，在当时的香山社会里肯定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和仰慕。孙中山所在的翠亨村也有几位在洋行做买办的同乡，他们在家乡买田置宅，过着宽裕的生活这一事实，在少年孙中山的脑海里曾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朝野上下呼吁变法改革、以图自强的声浪逐渐高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表达了比较系统的改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思想主张，对年轻且有志于救国救民救世的孙中山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1885年至1894年间，孙中山因求学和度假以及后来行医经常往返于香港、澳门和香山。这一时期，郑观应正在澳门潜心撰写《盛世危言》一书，过着一种相对悠闲的隐居生活。作为同乡先贤，郑观应其人其事，孙中山肯定早有耳闻，仰慕和攀附的心理驱使胸有大志的孙中山主动地走近郑观应。

郑观应在《农功》中就说孙中山“曾于香山试种罌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从医学的角度建议中国自种鸦片，以抵制印度进口鸦片。郑观应在《救时揭要》里就有弛禁鸦片的观点，后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鸦片》中再次强调。在试种罌粟的问题上，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出发点虽有不同，但他们在弛禁问题上看法基本相同。这说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上产生了共鸣。

但是，孙中山和郑观应何时何地通过何人而相识相交，至今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孙、郑相识是由陆皓东介绍的，因为陆皓东早在上海时就与郑观应有过交往^⑥。但可以肯定，郑观应在澳门闲居时期，孙中山曾与他有过一定的接触。夏东元先生就认为在1890左右孙中山就可能与郑观应有过来往，其理由是郑观应和孙中山都是香山同乡，翠亨与三乡雍陌相隔不到二十里，郑氏既为洋务前辈又有文名，1888年在乡休养三年，孙中山有机会认识郑观应。郑观应曾辑刊有《备急验方》、《中外卫生要旨》、《霍乱验方》，对医学可谓颇有心得。孙中山是学西医出身的，这样他们在医学上有共同的语言。再次是1890年前后，郑观应正闲居澳门，孙中山由港返乡也必经澳门，故应有交往^⑦。事实上，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里就有关于孙中山的情况介绍：“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罌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惟恐当道不能保护，反为之阻遏，是以踌躇未果”^⑧。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又曾与陆皓东一起去上海拜访郑观应，得郑观应的推介，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甲午春，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既抵沪，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藉港友涵介，分访王韬、郑观应诸人”。“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耀如二人。廷威为水师将弁，由官（观）应介绍相识”^⑨。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十日盛宣怀的函中称，“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唐心存为郑观应在上海电报局所用翻译。郑观应在致盛宣怀的信函中亦写道：“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邀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

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⑩。并谓“孙逸仙医生拟自备斧资，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以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过外部发给游历护照，以利遄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⑪。说明郑观应对孙中山的言行和志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抱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这次见面后，孙中山因上书目的不达进而选择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与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相去甚远。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中，郑观应将“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改为“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留心植物之理”^⑫。这样的文字表述显然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和自我保护的动机，因为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公开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成为统治者的异己分子而遭清廷通缉。尽管郑观应本人对孙中山并没有特别的恶感，但为了自我保护和少惹麻烦，他还是在修订《盛世危言》时作了巧妙的改动。辛亥革命前后，郑观应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似乎不太融洽，尤其是1906年至1907年的粤路风潮中，郑观应一度遭受来自香港和广州绅商的攻击，处境艰难。在这种名为“倒郑风潮”的运动中，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完全是站在香港和广州绅商一边，因此，郑观应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20世纪初年的关系如何，也就不言而喻。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郑观应反映十分平淡。尽管从根本上他并不反对孙中山的民主宪政，但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尚未具备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机和条件^⑬。在价值观念、思想倾向和社会地位、年龄等方面的差距，使他与孙中山私人的交往，未能保持下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但郑观应对孙中山的帮助和影响却不容忽视。

首先，通过郑观应，孙中山结识了当时中国社会中上层的一批有影响有实力的人物。如当时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政论家王韬、水师将官陈廷威，以及后来成为朋友和岳父大人的宋耀如，就是通过郑观应认识的。据黄彦教授考证，孙中山与同乡先贤郑藻如的交往之中介应是郑观应。因为他们都是李鸿章手下办洋务的重要人员，“谊同宗、生同里”，思想观点也非常接近，关系也非常密切。孙中山函书郑藻如很可能也是由郑观应转交的^⑭。

同时，郑观应的一些改良主义思想，也对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产生与形成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可以说，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对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孙中山来说，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据范振乾研究，认为他们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但郑观应有三大优点为孙中山所不及：一是郑观应有32年社会及洋务方面的实务经验，而孙中山当时尚在学或刚就业行医；二是郑观应的《易言》在当时再版数次，风行海内外，1892年又修增多篇，改名为《盛世危言》出版；三是郑观应早有因纺织及商务需要而有鼓励农垦及技术改良的经验，1875年《易言》即有《论开垦》、《论治旱》，及有关农产品生产、行销的观念，而孙中山1890年在乡村种罂粟，以作为补漏厄及禁烟的手段，在郑观应《易言》上卷“论鸦片”一文中亦早已阐释过了，故而认为是郑观应影响孙中山^⑮。而华中兴先生则认为郑观应对孙中山政治人格的影响有下列三点：（一）国家民族思想：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即言“西人之虎视寰区，凭陵中夏”；《创立农学会征同志书》中说：“今值国家多难，受侮强邻”，以及他在《原君》、《原臣》两书的扉页中，自署“杞忧公子”，将此三件事和郑观应具国家民族思想的笔名“杞忧生”联起来思考，可以发现孙中山忧虑列强欺凌而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心理及欲奋起行动的方案，实深受郑观应等人的影响而具体化；并且在北上天津前，孙中山在政治态度上应同于郑观应，即是列强入侵给中国所带来的危害更甚于满清官僚的腐败，故而意图从上书着手经济民生的改良。（二）求中国富强的民生社会改革思想：郑氏在1892年出版《盛世危言》自序中即提出“人尽其才”、“地

尽其利”、“物畅其流”三大改革原则，并要求洋务运动能名副其实。对比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与笔法，其主要观念几从郑氏著作中吸取采纳，差别只在于强调的重点与程度。（三）对中国现代化总体观念的启发：郑氏不但将中、西许多不同的概念加以调和，且提出具体方案。在政治上，如混合着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提倡地方自治；又如在议院中主要以举荐方式、推选贤与能的基层官吏作为人民代表。在社会民生与国家发展上，郑氏则欲透过国家力量结合民间资本，以“对抗列强经济侵略、保护国家利权、发达民族资本”。郑氏许多有关民生的策略，也为孙中山日后实业救国的理念，提供知识上初步启导的作用^⑩。

在香山买办群体中，与孙中山有联系的除了郑观应外，还有一大批商人。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时，就有不少香山买办参加。据有关史料记载，兴中会的第一批会员中香山买办商人就有何宽、郑晓初、黄焯文、张果、杨少佳、容星桥、刘祥、陆灿、杨心如等多人^⑪。兴中会第一次会议是在何宽家里举行的。当时何宽是檀香山一家美国银行的买办，因对兴中会的创立有功，被选为兴中会的副会长^⑫。孙中山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作出了到洋行做买办的选择，因为被洋行雇佣后就有了特权，清政府难以对他们施加淫威，这样更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香山人兴中会会员杨心如到台湾，在德商美最时洋行做买办，另一位香山兴中会会员容星桥则在汉口的一家俄商洋行里做买办^⑬。

容闳的堂弟容星桥是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之一，回国后不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辞去军职，赴香港经商，任太古洋行买办，并在香港结识了孙中山。他们都是香山同乡，又都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因此无所不谈，孙中山甚至称容星桥为哥哥。经孙中山的介绍，容星桥、关心焉和他的朋友都加入了兴中会。1902年容闳因清政府通缉不得不寄居美国，容星桥流亡香港，受孙中山指示协助陈少白办理《中国日报》。《中国日报》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第一份报纸，1904年因经费不足濒临破产。孙中山指示冯自由、容星桥等执掌报社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报社组织为之一变”，在与保皇派《商报》论战中取得了优势。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容星桥又成为同盟会员，仍经办《中国日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广东宣布独立，容星桥随《中国日报》回迁广州。胡汉民任广东都督，任命容星桥兼任广东省交通司副司长。二次革命后，容星桥离开广东，被孙中山任命为革命筹款委员会委员，继续为革命筹款，进行反袁活动^⑭。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容星桥，孙中山知道了容闳的消息。容星桥又多次写信容闳，转达孙中山对他的敬仰之情。在容星桥的穿针引线下，容闳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其思想也逐渐从改良主义向民主革命转变。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和容星桥遭清廷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在赴日本的轮船上，孙中山与容星桥、容闳相会。这次会晤，交换了各自对时局的意见，容闳对孙中山有了很好的印象，认为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因而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孙中山^⑮，并逐渐把革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认为孙中山是“一很重实际的人物”。他为孙中山介绍美国同情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家荷马李（Hemerlea）和西部财界人士查尔斯·布恩（CharlesB. Boothe），打算通过他们在美国募集巨款和训练一批军官，以支持中国革命，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这一计划虽然并未实现，但表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容闳已经是革命者的姿态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对此容闳十分欣慰。中华民国成立后，容闳一方面派儿子回国为建设效力，写信提醒孙中山，绝对不要相信连光绪主子都出卖的袁世凯，强调革命领导人之间的团结，积极为新生共和国各项建设事

业寻求国际贷款²³。

前面提到的买办商人杨心如（1868~1946），是孙中山的邻里，又是孙中山好友杨鹤龄的族侄。他“从小有大志，好读书，聪慧过人，过目不忘，时以策论雄侪辈，常同孙中山一起谈论国家兴亡大事”²⁴。受杨鹤龄和孙中山的影响，1895年加入兴中会，积极参与1895年孙中山组织策划的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并变卖家产充任起义经费。认为孙中山“昭示革命大义，推迹及遐，翠亨乡人，首义景从，心如附劳役骥未放后人”²⁵。广州起义失败后潜往台湾，在经营茶叶的良德洋行任买办。1897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台湾发展党务，得到杨心如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介绍了一批台胞加入兴中会，而且还积极为革命募集经费。1900年孙中山部署惠州起义时到台湾，入住杨心如的家。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杨心如一直在思想上与孙中山保持一致，在行动上也积极配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真正履行了革命者的职责，也尽到了朋友的义务²⁶。

从以上介绍中可知，与香山买办的交往，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香山买办群体自身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实力，以及社会政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得到他们的支持，无疑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香山买办是孙中山的同乡，他们在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上有相同相似之处，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也基本上符合香山买办的思想倾向和利益诉求，因此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有共同的心理基础。诚然，香山买办中也有不少只问经济利益不问国家政治，对孙中山其人其言其行既缺乏深入了解，又没有太多兴趣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同乡层面上的关系，不可能与主张革命，提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孙中山志同道合。不过，在香山买办群体中，以郑观应、容闳、容星桥、杨心如、何宽等为代表，在孙中山的成长和革命活动过程中，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孙中山与香山买办不同寻常的交往，因材料有限，难以深入探讨，但从有限的资料中亦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脉络。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香山买办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广泛而强烈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家乡建设的贡献和对同宗同乡的认同，在客观上激发了孙中山爱国爱乡的热情和反抗专制统治的斗志。他们在道义上和行动上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和提供的帮助，为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形成和革命活动之开展，在客观上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通过他们的指引、推介和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孙中山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赢得了更广泛的同情与帮助。尽管香山买办在人力和财力上对孙中山的支持十分有限，但在革命的创始阶段，他们的帮助哪怕是道义上的支持，都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和现实性的意义。而且香山买办的开放思想和创新精神，以及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孙中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香山买办在商场上的如鱼得水和在官场上的左右逢源，也激发了孙中山的人生梦想和自我实现的愿望。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特别注意结交工商界的朋友，把金钱看做决定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就多少与香山买办早期的经济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有关。可以说，没有何宽等香山买办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孙中山的早期革命计划难于实施；没有郑观应的引领，也许就没有孙中山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和振兴中华思想的诞生；没有香山买办的开放、包容、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大胆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也许就没有孙中山的开放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①张磊：《郑观应与孙中山》；黄明同：《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传承》；郭展礼：《郑观应对孙中山改革思想之影响》；徐新：《郑观应对孙中山的重大影响》。以上均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435页。王杰、邓开颂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高兆锦、胡波：《郑观应与孙中山》，见赵德钧主编：《孙中山与香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页。

③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6年，第75、114、132页；《孙中山故乡：翠亨》，香港：天马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40~42页。

④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二章；夏东元：《郑观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章。

⑤⑭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47、707~730页。

⑥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7~58页。

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9~110页。易惠莉认为1880年代与1890年代之交，孙中山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有志青年结成密友，常在一起谈论经济、时局，就选择的思想状况而言，孙中山自动的拜访在洋务运动思想领域已有成就的前辈，亦是处在隐居中的郑观应应属自然之事。另外孙中山密友中还有所谓“上海归客”——上海电报学堂毕业生，时在芜湖电报局工作的陆皓东的存在，更为郑观应与孙中山二人之间在此前已相识提供了充足的理由。郑观应对洋务、时务有广泛的知识及实践经验，这正是孙中山感兴趣者；孙中山则有相当的西医知识，而这又是吸引郑观应之所在。因此，郑观应与孙中山的交往不乏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易于发展为较深的关系。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430~432页。

⑧⑫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737页。

⑨陈少白：《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3~14页。

⑩沈渭滨：《1894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的一则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页。

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2页

⑬黄彦：《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⑮范振乾：《郑观应的改革理论（1860~1911）》，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77年3月，第255~262页，转引自华中兴：《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第90页。

⑯转引自华中兴：《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第91~92页。

⑰马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21页。

⑱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⑲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3卷，第76页。

⑳珠海市政协编：《珠海人物传》（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94页。

㉑刘禹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5页。

㉒戴学稷、徐如：《爱国华侨学者容闳》（下），广州：《暨南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0~12页。

㉓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第13~17页。

㉔秦毓蓂：《杨心如先生行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㉕李伯新：《孙中山故乡：翠亨》，第110页。

㉖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香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7~100页。

作者简介：胡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授、博士。广东中山 528400

[责任编辑 江中孝]